

霧都重慶的崢嶸歲月

葉周



以群當年對陳荒煤所抱怨的來自上海的壓力，其實是當年上海文藝界許多曾與周恩來有較多聯絡的藝術家的共同感受。

黃宗英曾經回憶過這麼一段：一九五九年江青來上海。有一天，江青派車把鄭君里，黃農夫婦和趙丹與她接到永福路的一個深宅大院。進門後見到了江青和一位市領導二人，他們也未介紹這是什麼地方，但憑我們的感覺，這可能是那位市領導的宅邸。

在一桌與時代極不協調，極盡奢華的宴會上，江青突然指着趙丹和鄭君里，對那位市領導說道：「我在上海只有這兩個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們倆託付給你老了。」然後江青又煞有介事地對趙、鄭二人說：「你們今後在上海有什麼事需要幫助的話，可以直接找我。我希望你們今後一定要多聽我們的，不要去聽他們的。」

「江青嘴裡冒出來的『我們』和『他們』，讓我們四人一頭霧水，着實有點懵，但又不便當面究其詳。」

後來這位領導聽說上影準備拍攝于伶創作的表現地下工作者茅麗瑛的《七月流火》，「立即沉下臉拍着桌子厲色地斥責道：……我們早就說過不要去寫什麼古人和死人，應當大寫十三年嘛，但你們還是要寫死人。你們就是不聽我們的，還是聽他們的！」

一九六五年初，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期間，江青在人大會堂山東廳——山東省的代表團會議上，突然一反常態，拍着桌子，當眾歇斯底里地衝着趙丹怒斥：「你搞什麼名堂！這幾年你們搞來搞去還是搞他們的那套，就是不聽我們的。」趙丹又一次被江青所指的「他們」搞懵了。

又是「我們」和「他們」。其實，對於上海文藝界來說，江青嘴裡的所謂「他們」的矛頭所指十分明確，就是指向周恩來。江青咬牙切齒痛恨的所謂「通天幹部」，所通之處也就是周總理。

四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群被提前從「四清」工作隊召回，回來之後當時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宣傳部長的張春橋找他談話。他陰沉着臉對以群說：你已經無須工作了，回家寫交代，接受審查吧。他指定以群交代「與周揚的關係，你的歷史問題，你與潘漢年的密切往來，你在重慶的活動……」

以群愕然了。多少歷經艱難險阻，用年輕的生命出生入死的敵後工作經歷，頃刻之間成為負擔，成為是否是反革命的實證，使他無法理解。

也許是長年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父親素來很少與我母親談工作上的事。可是接受審查後的一天，以群神色黯然地問：「文化大革命還有多久結束？」

「可能還有半年。」劉素明說。

以群深深地嘆了口氣，「要我再寫半年交代怎麼寫得出呢？他們要我將三十年前的事情全部詳細交代，我精神不好，寫不出，而且也實在沒有什麼重要材料可寫了。我並沒有做過對黨不利的事，寫流水帳又沒有意思，假造又不行，怎麼辦？重慶的事總理和張頌（她當時是周恩來副主席的文藝秘書）都是了解的，可是現在又找不到證人，怎麼辦？他們要我揭發周揚，也可以揭發別人，但是，我怎麼能隨便揭發呢？」無休止的逼供，使以群疲於應付，從《魯迅傳》到《文學概論》；從周揚又追到廣州會議，可廣州會議是周恩來總理到會講了話的呀！以群迷惘了。他終於痛苦地擱下了筆。並且張春橋特別點出要以群交代重慶的活動。可是在以群的心目中，重慶的事是周恩來領導的，有什麼需要交代，又有什麼可以交代。當年，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許多都是單線聯繫，組織的機密不能隨便透露，現在難道要對張春橋之流去交代周恩來安排的工作？以群的長年地下工作經驗不容許他這樣做。並且他也絕不會違心地去做說謊陷周總理的話。

如同又一次從會家岩周恩來的辦公室走出來，走向充滿生死危險的敵佔區，這次以群選擇了沉默，選擇了死亡……

以群死後，張春橋則悻悻地說：「一根線斷了。」

(四之三)

國會「海豹餐」

姚船



這天中午，加拿大國會山莊的餐廳擠滿了人，議員們暫時收斂剛才在嚴肅的議事大廳中僵硬的面容，享受一頓以海豹肉為主題的特別午餐。執政黨和反對黨議員罕有地歡聚一堂，並非為品嘗該餐廳百年一見的新菜式，而是在攝影機前爭相表態，以示自己的愛國情懷和對部分民衆的支持。

加拿大地處寒帶，有的地方是厚厚的冰川，生活在這片冰天雪地中的居民，不少以捕捉海豹為生。海豹在零下幾十度的環境中生存，經常在冰上水流竄，毛皮保暖防水。又因毛質光滑細密有光澤，深受皮草商青睞和顧客喜愛，傳統上每年都大批銷往歐洲，單前年對歐盟的輸出金額就達到五千五百萬加元。超過一萬五千人領有海豹捕獵證。海豹捕獵業成了加國的傳統產業，每年約捕殺三十萬頭。

但國際動物權組織極力反對捕殺海豹的行為，認為人們為要獲取完整的毛皮，在圍捕時往往將海豹活活打死，十分殘忍。有關組織曾多次到渥太華國會山莊舉行示威抗議活動，加國政府無動於衷。理由是，捕捉海豹是當地居民傳統正當的生活方式。而歐盟卻在動物權組織施壓和游說下，於去年立法禁止海豹產品入口，包括海豹的皮、肉和油等。這無疑對加拿大是一大打擊。

從各自的角度看，很難斷定誰是誰非；但作為維護國家利益，加國政府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去年聯邦總督到原住民社區訪問，曾在公開場合把海豹肉放入口中嘗試，引起一陣轟動。現在國會議員爭吃海豹肉，用意也許同出一轍，對歐盟和動物權組織表示不滿。

不少人批評國會的「海豹肉午餐」只是一場政治秀。實際上，國會既是國家的決策機構，所有影響國計民生的法例都在此誕生，但同時也是各政黨政治表演的最好地方。不會做政治秀的人，恐怕連要進入議事大堂佔上一席都很難。像近日國會復會，因前段宣布延長休會時間而備受抨擊的總理哈珀，在國情咨文中令人意外地加入要修改國歌歌詞，一時引起激烈反對聲音。兩天後，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表示「順應民意」，立即取消該條款。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在玩政治遊戲，轉移民衆對政府用拖慢國會會期來中止關在阿富汗虐俘問題聆訊的不滿。有人笑稱政府做「秀」確實做到家。

議員嘴裡一片肉，民衆口中一聲笑。免費午餐吃了，貿易糾紛纏結仍未解決，因為國際間的爭端靠做秀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一陣掌聲過後，生計受影響的原住民依然睡不着覺。

起名

馮進



最近美國的高爾夫球星老虎活士(Tiger Woods)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據說他和大太太大吵一場之後，氣沖沖地凌晨開車出門，發生了交通事故。太太用球棒擊碎車窗玻璃，不知是為救人還是為打人。由此想到一位師兄二十年前喜得貴子，絞盡腦汁，為長子起名的往事。那時正是活士打遍天下無敵手，冉冉上升、意氣風發的時期。師兄也愛打高爾夫，又喜得一「虎子」，顯然為孩子取名為「老虎」(Tiger)再合適不過了。

可是師兄和師嫂都是文化人，不願意起這麼直白明顯的名字，於是折衷英文老虎一詞的拼音重新組合，最後定名為「格來特」(Grant)。他們很得意，認為又別致又有意義。不知如今他們對孩子的這個名字又觀感如何。

古代中國人起名的花樣是很多的。在有乳名、小名、上了學有大名、學名。講究些的，父母取字，自己取號。出了家或者做在家居士可以有法號，寫文章可用筆名，唱戲要有藝名。皇帝可以給臣民賜姓賜名，他們自己死了有廟號，皇孫貴族也能有諡號。現在網絡上則多了馬甲，怎麼怪怎麼來；也是標新立異，凸現個性的一個辦法吧。去年春晚姜昆說相聲，聲稱：過去我們管兒子叫「狗子」，現在管狗叫「兒子」。

可見起名雖是個人行為，也能說明「兒子文化」和社會的變化。在美國教中文，也要給學生起中文名字。我的同事研究先秦文化，取名時往往用字雅馴，甚至不免晦澀。比方說，Kevin叫克龍，Stephen叫修文，Carolina叫家琳。我起名字就通俗多了。為難的是學生重名的很多，需要想出發音響亮、意頭好、又不重複的中文名字頗有難度。譬如，學生叫Benjamin的太多，我學起過的中文名有：本傑、那傑、柏民、奔等等。我自己較為得意的名字是Ryan叫雷揚，Neil起叫寧遠，Graham叫靈燭，Sarah叫雪麗。後來才發現我們這樣的私立學校，學生中名字重複是有原因的。

美國父母如果希望孩子將來成功幸福的話，多半會在起名時表現出這樣的期待。根據經濟學家的分析，有些名字彰現族裔，有些名字顯示家庭的經濟狀況。那些模仿上流社會，為自己的孩子取了「上上人」愛用的名字的父母，雖然現實中並沒有那麼富裕成功，但都望子成龍、決心下本錢投資孩子的教育。這樣的家庭，孩子在學校學習成績好不足為奇。例如，Benjamin就是一層「白人社會給兒子起名的常用名字之一」。不過，說到底，名字只是一個標誌，不是決定生死成敗的關鍵。

所謂英雄不論出身低。「搞怪經濟學」(Freakonomic)專家史蒂文列維(Sтивен Levitt)講了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真實故事。兩個孩子，一個出身於白人家庭，父母聰明慈愛、重視教育；另一個出身破敗的黑人家庭，母親不知去向，父親酗酒、虐待。最後這兩人都進了哈佛。

後者叫羅蘭多爾德(Roland Peter, 一九七二)，出色的經濟學家，哈佛歷史上獲得終身教職最年輕的黑人教授。前者叫泰德卡欽斯基(Ted Kazynski, 一九四二)，從小號稱神童，哈佛本科畢業，密西根大學博士畢業，被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的「大毒和航空炸彈手」(the Unabomber)；因為他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九五年之間向大學和航空公司寄出十幾個炸彈，炸死三人，炸傷二十三人。

西湖博覽會

——民國時期唯一一次大型博覽會記略

王鵬



上海世界博覽會將於今年五月一日開幕，歷時半年時間。這將是一次規模空前的盛會，屆時前去觀展的遊客可能達到近億人次。由此，我翻閱了一些資料，了解了中國最早參加世博會和八十一年前在浙江省杭州市舉辦的第一屆中國西湖博覽會的歷史。尤其是西湖博覽會，盛況空前，影響久遠，是近現代以來在中國內地舉辦的規模最大的博覽會，也可以說是中國會展業的開端。

世界性的博覽會開始於一八五一年的倫敦水晶宮博覽會，至一九二六年的費城世界博覽會，共計舉辦過十八次。在倫敦水晶宮博覽會上，中國商人徐榮村以「榮記湖絲」參展，曾奪得金、銀大獎。一九〇四年，清政府派出代表團參加了美國聖路易世界博覽會。一九一五年，國民政府派出四十人的代表團參加美國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榮獲一千二百一十一獎項，位列各參賽國之首。這些世界性的博覽會，一些有識之士呼籲展示實業發展成就，以激勵民衆，提倡國貨，保護民族工業。一九二八年，浙江省建設廳提出動議，擬舉辦西湖博覽會，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張人傑的支持。

一九二八年九月，浙江省政府為獎勵實業，振興文

化，接受了建設廳的提議，決定籌辦西湖博覽會。籌備工作於十月十五日開始，成立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籌備處設在省府建設廳內，由建設廳長程振鈞為籌備委員會主任。籌備處下設總務、工程、財務、場務、交際、宣傳、館所籌備、駐滬辦事、駐京通訊等機構，確定負責人，開展工作。安徽、湖北省、上海市及浙江省內七十五個市、縣各設西湖博覽會籌備分會，蘇州、無錫、常州、鎮江諸城以及安南(今越南)南圻、爪哇(今印度尼西亞)萬隆等地同時設立徵集西湖博覽會出口委員會，廣泛徵集展品。參加籌備人員先後達數千人，其中在杭州直接參加工作的有六百餘人。籌備處專門設計了西湖博覽會的會旗、會徽、紀念章和紀念冊，發行西湖博覽會獎券和紀念明信片。會場設有臨時郵局，凡加蓋「民國十八年西湖博覽會開會紀念」戳記的明信片，可免貼郵票，投遞國內各地。

一九二九年六月六日下午二時，西湖博覽會舉行了盛大開幕儀式。參加典禮的有國民政府代表孔祥熙、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朱家驊、行政院代表蔣夢麟、監察院院長蔡元培、浙江省主席張人傑和各省、市代表、來賓共計數百人，觀衆達十萬餘人。

在開幕儀式上，首先奏樂、鳴禮炮，由國民黨中央



西湖博覽會正門 (資料圖片)

清明螺



又到「清明」吃螺螄的時候了。

老家地處江南水網地區，縱橫交錯的河塘裡，生長着許許多多的螺螄。螺肉十分鮮美，無論是清蒸、生炒，都十分可口，是尋常百姓餐桌上的一道既經濟又實惠的鄉土美食。

記得小時候，要想吃螺螄，是一件十分便當的事情。家前屋後就是塘河，碧波粼粼的河裡，水草豐茂，螺螄成群，每當清晨或傍晚，一粒粒褐青色的短尾硬殼螺螄從河底的污泥中爬上灘岸，爬滿了水棧的一個個淺水石階，它悠悠自得，慢慢掀開頭頂的硬蓋，吐着兩根短短的、軟軟的觸鬚，把大半个身子露出殼外，安祥地棲息在水中。每天傍晚，我就拿着臉盆，到屋後的水棧石上，花一刻工夫，

就可摸來一二碗肥壯螺螄，拿回家用清水洗淨，倒入盛滿水的盆子裡浸養一夜，讓它把殼體內的污物全部吐盡。第二天再剪去螺尾，洗淨後放入葱、薑及油鹽醬清蒸，或放入葱、薑、糖等佐料生炒。這樣燒出的螺螄，味道十分鮮美，你只要在碗中抓起一粒，把螺口對準嘴邊，輕輕一吸，一團鮮美的螺肉就吸出來了。

當然，也有考究人家細細吃法的。把螺螄用開水燙熟，再用針尖把殼內的螺螄肉挖出來，去掉螺蓋。用螺肉同筍絲、茼蒿等生炒，也是一種美味佳餚。鄰居大伯每天下班，手裡總是提着一袋從農貿市場買回的帶尾螺螄，大伯把螺螄炒熟當作下酒菜。昏黃的燈光下，大伯一手端着酒盅，一手拿着小竹籤，呷一口酒，拿竹籤挑出一粒螺肉送到嘴裡，吃得笑咪咪的。

「清明」前後，是螺肉最肥嫩季節，自古就有

「清明螺鮮如鵝」的美稱。這時節，家家戶戶吃螺螄，飯桌上總能聽到「吱、吱、吱」的吸螺聲。母親是熟練調螺螄的高手，經她手燒出來的螺螄，不但沒有泥土味，而且還好吸，味道鮮美。她還能用螺螄做出一道道好菜，最拿手的要數螺肉蒸蛋了。拿一二個鮮雞蛋搗碎把蛋汁倒入碗中，用溫開水沖後搗碎成糊狀，再放入二十多粒出殼的螺螄肉，然後放在鍋中煮熟，旺火燒開後再燜一刻鐘，一碗黃澄澄的螺肉蒸蛋就好了，一粒粒青墨晶瑩的螺螄肉鑲嵌在淡黃色的蛋汁中，真像一幅名家筆下的水墨丹青。

近年來，工業發展，塘河的水質污染嚴重，河中的螺螄越來越少了，街頭集市上賣的螺螄，失卻了以前的鮮美味道。但願這昔日農村十分普通的河中「一鮮」不能像鱈魚、刀魚一樣難覓蹤影，永遠出現在千家萬戶的餐桌上。

魯人

一直有個傳聞，說解放後曾有人問毛澤東，如果魯迅活着會怎樣？後來，在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終於尋得佐證。確實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反右運動已經開始。毛澤東到上海小住，邀請了一些朋友聊天。在場的翻譯家羅隆南向主席提出了這個問題，魯迅在許多人心中的疑問。不料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要麼他識大體不做聲。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寫，要麼是識大體不做聲。羅隆南「頓時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發聲。」當年，在場的還有著名演員黃宗英，她在回憶文章中說：「我卻嚇得肚裡娃娃兒險些蹦出來……」當時，黃宗英正在北京，就被立案審查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先後觸及了二千一百餘人。其中，九十二人被捕，七十八人被正式定性為集團分子，二十三人被判刑，三十八人被判刑，而不同程度受牽連的人數則難以統計。不過，如果魯迅還活着，「胡風反革命集團」怕是會變成「魯迅反革命集團」了。

魯迅在晚年雖然接受了馬列主義和急先鋒的理論論點，但他骨子裡始終是一位保持着一五四「精神」的人道主義者。

如果魯迅還活着

魯迅在思想上是深刻的，在政治上卻常常顯出他的天真。對於革命他總是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只要一革命，天下便從此安寧，百姓從此安居樂業。因此，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魯迅欣喜若狂。當紹興城裡謠言四起，市民人心惶惶時，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組織了武裝演說隊，並親自帶隊上街宣傳，安定了民心。他還鼓勵支持青年編輯出版報刊，宣傳革命。但局勢的發展，很快便宣告了他希望的破滅。

後來他又對南方的國民政府充滿期待，以至千里迢迢奔了去。但「四一二」慘案，又把他的幻想打破了。

其實，魯迅犀利的筆鋒針對的並非是某個政黨，他不關心政治，關心的只是被壓迫者的自由、平等和尊嚴。就像高爾基在十月革命後，批評蘇維埃政權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過於殘酷一樣，魯迅反對的也是現實中的壓迫。而這種壓迫是會隨着政權的交替而改變的。魯迅同情的永遠是那些被壓迫的對象，這是為任何政權都不歡迎的。正如有人會對胡風骨幹分子賈植芳所說的那樣：「解放前我們喜歡亂臣賊子，現在當權了，就喜歡忠臣孝子了。」

毛澤東對魯迅是很了解的，所以，他稱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卻唯獨不稱他為政治家。說到底魯迅還是一個文人，不管他的思想多麼深刻，不管他對中國社會了解得多麼透徹，在政治上卻始終天真得可惡。